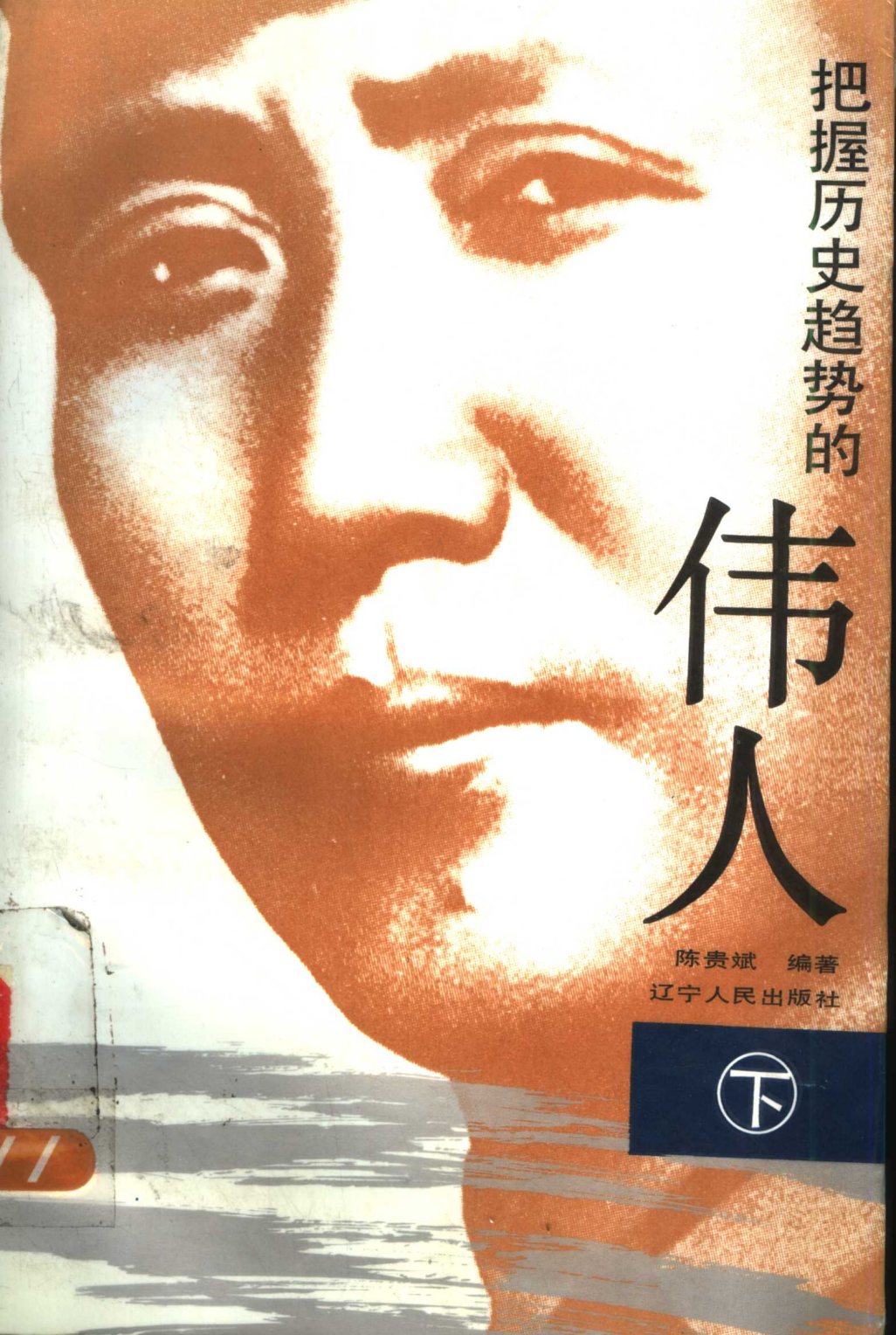




把握历史趋势的

伟人

陈贵斌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下

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_{下卷}

陈贵斌 编著

(辽)新登字 1 号

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上、下卷)

Bawo Lishi Qushi De Weiren

陈贵斌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铁岭市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200,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47
	印数:1—17000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建忠	版式设计:李 夏
封面设计:刘冰宇	责任校对:李文杰

ISBN 7-205-02393-9/K · 271

(上、下) 定价: 25.00 元

【六十九】

攻占昌都以战求和 解放西藏农奴翻身

1949年10月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西藏黄教两大主教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早年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势力“热振派”的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中央代表，痛哭流涕地再三“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

1949年11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班禅。电文中说：

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意愿。

还是在1949年夏秋之交，当解放兰州的狗娃山战斗打得炮火连天之时，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就接到西柏坡发来的急电。

毛泽东在这封发于8月6日“未鱼”时分的电报里，对解放兰州和大西北进行了周密部署，特别指示对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当时全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解放，许多地方还在进行激烈的争夺，但毛泽东的目光显然已从西柏坡的土屋越过高山大河，落在了世界屋脊布达拉宫的金顶上。

彭德怀接到电报后，立即让有关同志与兰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杨石联系，了解情况，得知班禅已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离开了塔尔寺到了香火地香日德。当即又派中央军委情报部驻青海联络站的余凯和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一起带领几个宗教界有影响的活佛到那里去做班禅堪厅的工作。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不久，彭德怀又立即打电报给青海，让青海方面在班禅的供养寺庙——塔尔寺选派活佛去做班禅的工作。不久，甘南拉卜楞寺的活佛嘉木样，还有拉卜楞寺中班禅很信得过的原九世班禅的经师都先后去香日德，对班禅大师耐心地善加开导。出于对共产党的感谢和信任，班禅大师于9月28日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了那封有名的致敬电。

这时已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城的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后日理万机之中，仍然关注着那片积雪高原。1949年11月23日他又致电彭德怀，提出以西北为主进军和经营西藏。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到川康平定之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出国访问途经满洲里时，

给中央领导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写来一封信，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元旦刚过，1950年的第二天，毛泽东又急如星火地从遥远的北方致电：“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告小平、伯承、贺龙三同志。”电报指出：“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现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指出“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指示“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作好准备，按期进藏。

电报末尾注明“1950年1月2日于远方”。这个远方是遥远的莫斯科。

十八军来自豫皖苏地区，从河南出发，经过安徽、江西、浙江、湖南、贵州到达四川。当时整个部队都有一种动极思静的思想。当听说毛泽东亲自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又相互庆幸起来。

1950年3月下旬，十八军成立了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军副参谋长李觉、藏族长征干部天宝等人组成的前线指挥所，同时派出了南、北两路先遣支队。南路先遣队以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该师一五七团取道泸定、康定、雅江、理塘，走南路抵达巴塘一线。在这之前，平措旺阶和陈竞波等人由一个加强排保护已于6月进驻巴塘。北路先遣支队由五十二师师长吴忠率领一五四团和军工兵营取道雅安、康定、乾宁、道孚、炉霍，4月底到达甘孜，主要任务是开辟甘孜、邓柯、德格等前进基地。由于执行了邓小平的“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的指示，藏胞踊跃支前。

毛泽东关注着西藏的动静。他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

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在各路赴藏劝和团达不到预期目的时，他考虑了昌都战役。

昌都，位于西藏东部澜沧江上游扎曲和昂曲两大支流交汇处，当时居民有3000余人，扼进藏南、北、中三路之要冲，噶厦在此建立了总管府，指挥着占藏军总兵力三分之二的九个代本（团）和民兵8000余人。这8000余人分布在沿江1千多里正面防线和昌都附近宽700多里的纵深地区。

当解放军临近金沙江东岸的时候，昌都基巧（专员、总管）拉鲁·才旺多吉任期已满回拉萨。但在拉萨的三位噶伦谁也不愿在这个时候赴任昌都。于是，摄政达扎决定，破格提升孜本（人事审计官）阿沛·阿旺晋美为增额噶伦，前往昌都接任。

阿沛·阿旺晋美于1911年诞生在拉萨以东100多里路的甲玛沟的一户贵族世家，小时名叫阿旺晋美。他从小就聪慧，在拉萨的一家私塾学习藏文。14岁那年，他拜在一代佛学大师喜饶嘉措门下，学习文法、诗学、历史和哲学。喜饶嘉措大师学问渊博，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为人刚直有如青桐，在藏区享有盛名。阿旺晋美跟着大师，暮鼓晨钟苦学三年，又拜东藏神秘灵异之地——三岩地区红教派的大苍活佛为师，习诵佛学经典，度过两个寒暑。当他20岁那年重返故乡甲玛沟时，已经称得上满腹经纶了。

甲玛沟是个只有140多户人家的农牧结合的山乡。20岁的阿旺晋美接替母亲管理自家的庄园。他在读书之余，同农奴们一起收割青稞，一起放牧牛羊。农奴们比“二牛抬杠”犁地的犏牛还要苦累，有的就累死在地里；还有的渴望像草原上的牛羊那样自由，宁死也要逃亡。年轻的阿旺晋美为苦难的农奴洒

下过泪水。尽管佛学经典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前生注定的，今生受苦是由于前世有罪。但是，日益破败的庄园和悲惨的农奴生活仍使他感到忧伤。他在心里老是对自己说：这样下去，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雪域西藏就要崩溃啦。西藏的制度需要改进，农奴们应该活得更好些，他们毕竟不是牲口，也是黑头藏胞呀。可是，祖宗传下来的制度怎样才能改进呢？农奴怎样才能活得像人样儿些呢？他却感到一筹莫展。他唯一能够做到的，便是在他管理的庄园里，将收到的地租粮借给农奴和差巴（佃户）们维持生活，不收任何利息，到秋后归还，还不起的也就算了。在乌拉差役等方面也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阿旺晋美这样做，往往要受到别的贵族的讥讽及家人的责备。但是，受到佛学“众生平等”思想熏陶的阿旺晋美，我行我素，不以为悔。凄惨的现实使他萌生了最初的民主思想。

在甲玛沟一晃3年过去了。阿旺晋美23岁的那年冬天，参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组建的“仲扎兵营”。这是一支由贵族和富户子弟组成的藏军部队，相当于团的建制，约有1200多人。阿旺晋美在这里接受军事训练，过了两年的行伍生活。很快由班长升任排长、营长。本来是文弱书生的阿旺晋美，在兵营里成为威武有力的军人。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仲扎兵营”被解散。而阿旺晋美未回甲玛沟，他奉命守卫西藏地方政府的造币厂和军火库。也就在那一年，英武的阿旺晋美受到大贵族阿沛家族的青睐，他被招赘为阿沛·才旦卓嘎的夫婿，并以阿沛家族的名义，受封为小四品官。“阿沛·阿旺晋美”实际上是入赘阿沛家族以后所取的名字。

阿沛家族是西藏最古老的贵族世家之一。封地在甲玛沟以东还有三百里路的太昭（今工布江达县）。1904年英国侵略军进

攻江孜时，老阿沛带领民兵数百人参加抗英大军，奋勇杀敌，血溅古城，留下赫赫声名。作为阿沛家族封爵继承人的阿沛·阿旺晋美，自然厚受荫蔽。由于精明强干，颇有政绩，34岁那年被提升为孜本，也就是噶厦的人事审计官。这是仅次于噶伦的高级官吏了。

现在，由于解放军挺进到金沙江以东，42岁的阿沛·阿旺晋美临危受命，被推上噶伦的高位。他清晰记得去年年底的一次重要官员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对共产党解放军是战是和。一些与会的官员在咬耳朵，说什么“共产党青面獠牙，绿须红眉，是一群吃人的恶魔。”阿旺晋美对此甚感厌烦。他说：“谣言中讲的那些事，我是不信的，我相信共产党也是人，而不是魔鬼。反过来讲，如果共产党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个样子，又假设他们有1亿人，那么4亿5千万中国人还有3亿5千万人不是共产党。我们常说：‘针能过去的，线也能过去。’3亿5千万人同共产党相处，能过得去，我们西藏100多万人也能过得去。”当有的官员提出要同共产党较量时，阿旺晋美感到吃惊。他说：“要同共产党打仗，实在是用鸡蛋往石头上擗。据说国民党有800万军队，还有美国的精良武器，同共产党打了十几年，非但没有打赢，反被共产党消灭了。西藏男女老少齐上阵也不过100万，又没有精良武器，怎么打？我看只能和谈，不能打。”

阿旺晋美言之凿凿，把那些对谣言信以为真，主张同共产党兵戎相见的人，说得哑口无言。不少人在心里认为阿沛言之有理。但在噶厦内部，还有相当一部分掌权者把希望寄托在金沙江天险和英、美等外国朋友的援助上，结果仍然是“主战派”占了上风。

关注西藏动静的毛泽东希望和平解放西藏，但也作了战斗

准备。

关于昌都战役，他胸有成竹，指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他要在藏军心理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毁灭其全部有生力量，避免以后再与藏军漫山遍野地打游击与消耗战。他要使噶厦全面丧失抵抗能力。

8月15日，毛泽东看完西南军区作战计划后电示：“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方似有相当强战斗力，必须准备。”另外两条批示是关于补给运输的：“一、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随军队进攻速为修路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是否适于空投？”

西南军区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是，南北两线合围，兵分五路出击。

两线合围的五支红箭虽然有虚有实，但一旦射出，必将石破天惊，地动山摇，整个世界屋脊为之震动。

8月28日，毛泽东给西南局并西北局的电报说，如我军能于10月份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以战促和，还是希望和平解放那一片雪山高原。

8月31日，毛泽东批示：“购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西藏进军。”

1950年8月3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10个月，彭德怀挂帅出征朝鲜战场正打得炮火连天，鸭绿江那边硝烟弥漫的天空需要人民中国的战鹰。但是，毛泽东还是咬咬牙，把30架飞机批给进军西藏的部队。而西藏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岂是“30架”高空运输机所能承载的！

再说解放军经过千里迂回的急行军，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堵住了藏军逃窜察隅之路。10月12日，从昌都以南的宁

静（芒康县），传来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 340 余人宣布起义的消息。霎时如雪崩一般，昌都藏军的军心崩溃了。

10 月 16 日夜，总管阿沛得知解放军已逼近昌都，类乌齐一带后方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军队。早就不愿抵抗的总管命令，翌晨弃城西撤。17 日，弹药库的爆炸声震得昌都城颤抖不已。随之，藏政府官员、士兵们拖儿带女顺着两边的山麓仓皇离开昌都。乱兵沿路抢劫，为解放军赢得民心铺平了道路。

整个昌都战役过程中，解放军只在小乌拉岗托等三处遇到了较强硬的抵抗。昌都战役于 24 日结束，历时 18 天。经过大小战斗 20 余次，全歼昌都藏军总部及 3、7、8、10 等 6 个代本全部和 2、4、6 代本之大部，并争取第 9 代本起义，共计歼敌 5700 余人，占当时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员 18 名，英、印特务福特等 4 名，缴获山炮 3 门，重机枪 9 挺，轻机枪 48 挺，各种冲锋枪，步枪 3000 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整个西藏被解除了心理和实力上的抵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平谈判。

住在昌都解放军指挥机关的阿沛，经过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和其他解放军将领的不断的情深意切的谈话，疑雾慢慢消散了。他代表 44 名官员给 17 岁的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

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时机。共产政府所规定的基本作法是，对外五族团结一致；对内各大小民族自治政府，其工作人员根据单一民族和多种民族人数多少来确定；大民族绝不压迫小民族，特别是对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对大教主全知佛王达赖今后仍然主持政教，教主摄政王活佛及各僧俗官员照常供职；保护宗教、寺庙和经堂；西藏现行政治和军事制度均不予变更；藏军改编入国防武装之内；帮助西藏人民发展

文化教育和农、牧、工商业。……目前汉藏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诉利弊的作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

噶厦大员们看了来信，半信半疑，还有人又气又怕。他们感到，如果继续与解放军作战，已没有力量；派代表和谈吧，又有点于心不甘。于是，就在神前打卦抽签，问达赖喇嘛是留在拉萨，还是前去印度。结果，卦签上写着的是“出走”。因此，达赖喇嘛在1950年藏历11月11日夜简装轻骑，逃往亚东去了！

达赖喇嘛在中印边界亚东“东噶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时，西藏噶厦的一些“洋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想想一年多以前，“洋朋友”那样起劲地鼓动噶厦驱汉；想想3个月前那样卖力地支持噶厦凭据金沙江顽强抵抗；再想想……如今噶厦不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于是呈文达赖喇嘛。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三人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译钦波（秘书长）土丹旦达为代表，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进京。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车站的迎客站台上簇拥着数百名欢迎的人群。19点10分，当阿沛·阿旺晋美一行西藏代表走下列车的时候，他们很快便被鲜花和儿童包围了。引领着儿童和鲜花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郭沫若副总理、林伯渠秘书长、民族事务委

员会李维汉部长等，他们亲切的问候，朗朗的笑声，驱散了北国春夜的寒风。阿沛代表一行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感受到了春花的芳香和春意的浓烈。

4月27日晚上9时，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也从西安来到了北京。

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周恩来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彗星四射。祝酒词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人心头的一盏灯，一团火。共和国总理的风度使阿沛十分倾慕。他想：共产党里的大人物真是一个个都像夏夜天空的大星那样让人敬仰啊。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五一节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阿沛一行向毛泽东献了哈达。毛泽东高兴地握住阿沛的手说：“谢谢，谢谢，欢迎你们来北京！”并叮嘱他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李维汉解决。

1951年5月23日，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经过协商，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了和平解放。中南海怀仁堂的签字仪式即将圆满结束。倏然间，5月的蓝空响起一声焦脆的春雷：“轰隆隆……”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们先是一惊，继而都面露喜色。“……协议签字时，天上打了雷，这是龙在吼叫，实在是一个圆满之兆，必主雪域从此和平安康幸福隆昌……”

协议签订后，毛泽东于5月24日下午接见了阿沛为首的代

表团成员，与他们合影留念。

在接见时，毛泽东请他们吃糖、喝茶、抽烟，一一询问他们每人的名字、年龄、在地方政府的职务，问由大高原到北京后身体适应不适应，生活习惯不习惯。慢慢消除了他们心情的紧张。又问他们怕不怕革命？当有位代表说有些害怕时，毛泽东笑了起来，说：“你们不要怕，革命是解放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进军西藏是解放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又解释党的民族政策，说：“藏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在历史上，西藏地区的人口曾达到1000万人，现在藏族人口减少到100万了，这样继续几百年，藏族就会灭绝的。你们希望不希望发展呀？”阿沛回答后，毛泽东又说：“我们共产党要帮助所有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还帮助发展人口。”毛泽东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勉励他们为加强汉、藏人民的团结作出贡献。

5月24日晚上，为了庆祝协议的签订，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了盛大宴会。应邀出席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厅随员，西藏地方政府的五位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中央人民政府的四位全权代表及有关人员。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

在宴会上，毛泽东、班禅大师、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郎旺堆、计晋美、陈叔通、李维汉、马寅初、平汪坐在第一桌。毛泽东、班禅和阿沛都讲了话。毛泽东致词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尤其是汉族和藏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族内部也是不团结的。这是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

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造成的。现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力量，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力量，班禅大师领导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了，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建设新西藏！”

然后，毛泽东端起酒杯说：“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干杯！”

席间，毛泽东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显得特别高兴。他兴致勃勃地讲到，历史上有个常胜将军薛仁贵，却被吐番王国的军队打败，吐番的军队还有两次攻入长安，这说明西藏是一个伟大而强悍的民族。

那天的宴会，气氛非常融洽，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的亲切关怀。西藏和谈代表也深深感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1951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的主力渡过了一条蔚蓝色的大河，进入了世界屋脊名城——拉萨。至此，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和若干岛屿外的全部国土。

【七十】

首次出国访问苏联 接受援助不失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毛泽东就着手作访苏的具体准备。

毛泽东说，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要“另起炉灶”，在新的基础上制订自己的外交政策，“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次访苏的具体准备，主要是文字材料和礼品。文字材料是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指导下完成的；礼品委托杨尚昆去办理，但江青插手了。她提出，一定要带山东的特产。于是除湘绣、磁器、茶叶、竹笋外，一车皮大多是山东的大葱、大白菜和大萝卜。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此行的决定是：给斯大林祝寿之后，毛泽东就在苏联休息，条约的谈判则由周恩来随后去办。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很少，只有陈伯达（政治秘书）、汪东兴、叶子龙（身边工作人员）、师哲（俄语翻译）。苏联驻中国大使

罗申和负责中长铁路恢复工作的柯瓦廖夫也同行。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负责送行。

就在行将出发之际，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制订了颠覆毛泽东所乘专列、暗杀共产党领袖的罪恶计划。国民党的密电被解放军情报机关从空中截获。毛泽东给公安部下达了限期侦破的命令：“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公安部接到这份绝密令后，立即调兵遣将，经过周密侦察，目标集中到一个叫计兆祥的人。不久，此案移交给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直接领导。

12月6日，毛泽东一行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经过天津时，发现铁路上有一颗手榴弹，罗瑞卿下去调查处理。李克农、毛岸英继续送到边境。

此时，台北近郊。

一座座隐蔽在浓郁茂密树林中的国民党保密局本部，笼罩着一种神秘可怕的气氛。

神经过敏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刚刚接到人民解放军即要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的情报，又接到情报部门报告：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已集中大批部队，空军已进驻华东的一些机场，登陆舰艇也正在一些港口集结。看来，那阵势是对着台湾来的。

毛人凤面带难色，忧心忡忡。而蒋介石这时正在阿里山庆寿。他暗自思忖，如果在毛泽东访苏归来时干掉毛泽东，中国的风云就会发生突变。不把握住这个时机消灭毛泽东，蒋介石不会答应！

这时，急功近利、坐阵督战的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对毛人凤说：“立即电告计兆祥，报告潜伏大陆暗杀队的准备情况，对